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时代内涵与世界意义

胡 键

内容提要:中国式现代化肇始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形成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士大夫开始思考民族振兴的问题。虽然历经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但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并未完成。“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不仅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逐渐找到了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道路。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在实践上是完全统一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路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关键词:和平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路径

党的二十大向世界声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①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是与和平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可理解为,和平发展原本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中国什么时候背离了和平发展道路,那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走向了失败。这一判断不仅被近代中国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所证明,也完全符合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一方面,处于21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一个客观事实,从总体综合国力的增强,到国际地位的提升;从人民福祉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到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都彰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航程。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肇始于西方的船坚炮利之下,是在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页。

西方的强权逼迫之下开启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民深知被掠夺的悲惨、战争的血腥,以及领土主权丧失的屈辱。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使中国倍感当今和平发展道路弥足珍贵,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一 中国现代化的概念表述及其变迁

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内容的时候,我们都无法回避几个重要的概念,如“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尽管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诉求,但在探索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随着实践的不断成功而逐渐表达出来的。因而,要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研究上述历史概念。

“北京共识”虽然不能说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概括,但它是中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路径的一种“共识”性概括。第一个使用“北京共识”的是印度新德里公共利益研究中心(Public Interest Research Centre)主任卡瓦吉特·辛格(Kavaljit Singh),他在200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此概念。^①2004年5月,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柏·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的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对“北京共识”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当时一个重要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俄罗斯和中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陷入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俄罗斯的情况最为严重,不仅经济严重下滑,而且街头政治不断,这一切正是“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方案种下的苦果。因此,同以往的革命一样,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不能照搬任何国家的经验,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与俄罗斯不同,中国的经济转轨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定律”^②:一是“创新”,即“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和损失”;二是“公平”,即“努力创造一种有利于持续和公平发展的环境”;三是“自主”,即“凭借自身的实力成为强国”。换言之,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虽然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实践,但仍强调独立自主。这正是雷默所阐释的“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的概念一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国际学术界对其褒贬不一。西方左翼学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大多表示赞同,而新自由主义学者则表达了自己对“北

^① Kavaljit Singh, “From Beijing Consensus to Washington Consensus: China’s Journey to Libe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sia-Pacific Journal*, No.7, 2002.

^② 雷默:《北京共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9、32页。

京共识”的批评。^①当然,最为关键的是中国学者对它的看法。尽管国内大多数学者赞同这个概念,但在使用的时候比较谨慎。这是由于讨论“北京共识”的时候是针对“华盛顿共识”而言的,而且是把“北京共识”置于“华盛顿共识”的对立面。就当时中国的情况而言,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但与美国相比,中国依然处于明显的弱势,以“北京共识”表述中国现代化的丰富内容显得过于简单,更不是有的学者认为的“北京共识”超越了“华盛顿共识”。^②鉴于此,有学者指出,“北京共识”的核心不在于“共识”,而在于“北京”这个中国的象征,强调中国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以照抄照搬的样板,而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而绝不是“发展中国家理所当然应走的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③当然,也有学者用“北京共识”来概括中国过去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实践经验和未来的发展战略。^④然而,对于前一种概括比较确切,但作为对未来发展战略的表述,显然已经不再适合。

在此情形之下,又出现了“中国模式”的概念。这一概念究竟是何时提出来的,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说法。但是,“中国模式”实际上有两个参照对象:一个是“苏联模式”,另一个就是“西方模式”。苏联解体后,中国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比较多,但由于当时中国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反思“苏联模式”是从否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开始的。当然,不可否认,计划经济体制在特殊时期发挥了独特的、积极的作用,只是经济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之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没有顺应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无法确保经济要素正常发挥配置功能。然而,在反思“苏联模式”的过程中,也有学者不赞同“中国模式”之说,认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⑤即便有不少学者接受“中国模式”的概念,但要么是把“中国模式”误认为是私有化;^⑥要么是对“中国模式”提出了警告,认为如果中国不进行与经济改革相匹配的政治改革,

^① 参见刘庆军、郭文亮:《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研究进展》,载《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第158-159页。

^② 何恒远:《超越“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的转型意义》,载《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第15-19页。

^③ 张幼文、黄仁伟等:《2005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④ 谢立中:《北京共识:中国经验的历史总结,还是中国发展的未来战略》,载《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第123-129页。

^⑤ [德]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第9页。

^⑥ Barry Naughton, “China’s Distinctive System; Can It Be A Model for Oth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9, No.65, 2010, pp.437-460.

“中国模式”将不可持续。^①当然,更多的学者力挺“中国模式”,尤其是在“西方模式”,主要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在俄罗斯和中东欧一些国家遭遇困境的时候,面对中国经济渐进主义转轨的成功现实,众多西方学者开始认为“‘中国模式’正在代替新自由主义模式主导的发展话语权”。^②因此,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不用论”“慎用论”“必用论”的不同观点。^③

不过,在对“中国模式”的赞扬声中,我们发现有一种声音是值得警惕的,即把“中国模式”视为“西方模式”的替代物;或者是认为,“中国模式”会超越“西方模式”。这种声音同“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一样,也是把中国置于西方的对立面来研究,最终难免会将中国陷入与西方对抗的陷阱之中。中国开创的现代化模式,无论这种模式是否成功,都不是为了反制西方而形成的,而是基于中国的客观实际形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④也就是说,如今,中国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达到西方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谋划中国的发展战略时指出:“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⑤这同样意味着中国的发展首先要达到西方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不能表述为“超越”。因为“超越论”带有非常强烈的对抗色彩,若强调用中国的发展模式去超越西方的发展模式,这种对抗性思维的结果,必然会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西方的威胁,西方也必然要主张遏制中国。

无论是“北京共识”还是“中国模式”,实际上都在试图解释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于是在讨论中形成了“中国道路”的概念。有的学者甚至是在否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中国道路”的概念,认为“模式”总是倾向于制度层面的具体表述,带有相对静止、单一、平面等特点;“模式”在事实上产生了是否真正存在的疑问,同时若过分强调也容易在实践中导致制度或体制的固化,甚至僵化的现象。而

① Suisheng Zhao, “The China Model: Can It Replace the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9, No.65, 2010, p.424.

② Shaun Breslin, “The ‘China Model’ and the Global Crisis: From Friedrich List to a Chinese Mode of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7, No.6, 2011, pp.1323-1324.

③ 胡键:《争论中的中国模式:内涵、特点和意义》,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3-1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道路”则不然:首先,它强调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宏观分析,因而“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性和包容性”;^①其次,对“道路”的研究与概括,除了客观描述其发展态势或过程外,还涉及其发展特征和特征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文明变迁等。因此,加强对“中国道路”的思考和总结,不但能帮助我们更为恰当地分析中国以往的发展经验和本质,而且有利于新形势下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②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讨论“中国道路”的问题无法回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话语框架,这是因为“中国道路”是以社会主义为旗帜的、强调的是改革开放前后的一贯性和继承性,尤其强调区别于以欧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道路。因而,这同样难以避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逻辑,而在这样的对抗逻辑之中,存在“中国的崛起将会改变世界”的判断,^③这个“改变”很容易让西方感到是对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颠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道路”是源于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的遗产,“中国道路”不是简单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相反是拯救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不过,“中国道路”要拯救资本主义不仅有其独特的规模体量,而且有其独特的历史轨迹。因而,“中国道路”也就不可能被其他发展中国家简单地模仿和照搬。^④当然,西方学者的观点只能作为一种参考,不可视为圭臬。“中国道路”只能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总结,既不是颠覆既有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的方式,也不是拯救资本主义的方式。“中国道路”就是“以自己的历史逻辑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并对其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⑤正是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逻辑、国情和现代化实践,必然产生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⑥

二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虽然是在当今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但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底

^① 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6页。

^② 韦定广:《创造与贡献:世界体系视域中的“中国道路”》,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2页。

^③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llen Lane, 2009, p.12.

^④ Barry Naughton, “China’s Distinctive System: Can It Be A Model for Oth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9, No.65, 2010, pp.437-460.

^⑤ 胡键:《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逻辑、经验、前景》,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7期,第38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页。

蕴,是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中萌发而来的。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肇始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在此之前,中国几千年来是这样一种社会:“以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为基本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同时又是自我消费单位;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以家庭手工业附属于农业。三者构成了自然经济的内涵和本色,这就是支撑起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显然,它的稳定性就存在于它的保守型之中。”^①然而,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撼了古老的华夏大地,这迫使中国士大夫不得不进行反思:泱泱大国为何惨败于“蛮夷”?而士大夫们的反思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始。换言之,正是西方发动的殖民战争促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从而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艰难的探索历程。

当然,战争带来的不只是西方的枪炮对古老中国的震慑,也同样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在当时的情况下,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包含了学习西方文化的内容,其中既强调了学习西方技术的重要性,也强调了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必要性。当然,林则徐、魏源时期还没有“现代化”(最初称为“近代化”,下同)这个概念,学习西方技术主要还是为了“制夷”。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自强”口号下洋务运动的兴起,历史让我们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中国一部分“向洋看世界”的士大夫开始产生了“现代化”的自觉。但是,这也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枪炮声和国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中获得的教训,从而把学习西方文化,尤其是技术文化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并且以“中体西用”为口号来推进中国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作为一次向西方学习的社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通过向西方学习而走向现代化的主张却一直延续到孙中山时期,乃至之后的历史阶段。也正因如此,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把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总体上看成洋务运动的全过程,在这中间作为某种政治过程出现过变法、革命等运动和对抗形式”。^②如果我们认同这个观点,那么就意味着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的变革与演进就是一个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因而也就自然产生了这样一种认知: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中所讨论的“现代化”主要就是指“欧化”“西化”。^③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和对现代化的认知也是在不断深化的。历史学家郭廷以先生指出,中国社会逐渐认识到“西方文化虽不完全等于近代化,但如果撇开西方文化,近代化的内容也就所余无几了”。^④

① 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②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69页。

③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页。

④ 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不过,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接受西方技术和文化之后,又不断遭受西方社会学说的“冲击”,并且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学习西方社会学说。如果说郭嵩焘出使英国,逐渐对英国社会产生了一种积极的认知是属于被动地接受西方的话,那么严复留学英国,后来又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社会学说,就是完全主动地学习和接受西方学说了。郭嵩焘被动地学习西方为大清顽固派所不容,但严复的大量译著却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梁启超及其后来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以及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都接受了严复所翻译的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当然,鉴于梁启超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他在这方面具有标杆意义。在19世纪90年代,梁启超的思想受到严复译著思想的影响很深,也正是在此时,他几乎全面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考察欧洲之后,撰写了《欧游心影录》这本小册子,其中提出了四点心得:“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文化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①这是亲眼见到战后欧洲的梁启超对欧洲文化的深刻反思,从而提出了“东西方文化调和”的主张。事实上,梁启超的这种主张代表了“五四运动”以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当然,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倡导全面接受西方文明。这两种价值取向导致的文化大论战在中国文化场域中持续了二十余年之久,最终被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成功的社会实践所消弭。

由此可见,尽管近代中国社会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是因为西方对中国发动的殖民战争,但被西方殖民者践踏的沉痛经历和深刻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抛弃对外的掠夺性战争。当然,中国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的必然,而只能说是中国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中国式现代化才有了可能。从上述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历经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落后情形的三重反思。

首先是器物文化上的反思。林则徐、魏源倡导的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是自“康乾盛世”以后,在西方的炮舰政策之下,第一次从器物文化上对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进行的反思。但是,直到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器物文化上对中国社会的反思仍是非常肤浅的。这是因为,即便是类似林则徐、魏源这样的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都

^①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十集),汤志钧、汤仁泽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5页。

具有两面性的文化认知:一方面,如林则徐“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刊物”;^①另一方面,如林则徐又“不肯公开提倡改革……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②洋务运动时期,尽管洋务派官员将魏源的“师夷长技”放大为“学习西方物质文化的洋务运动”,但“中体西用”仍然是当时限制中国士大夫认知水平的“最高尺子”。^③简言之,当时在器物文化上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受制于文化观念和制度落后的束缚,文化观念依然是“天下观念”,而制度则是大清的专制制度。

其次是制度文化上的反思。制度文化上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其直接诱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这早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但是,在此之前,即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一些识时务者高唱“采西学,制洋器”的时候,极少部分人已经注意到制度的问题。梁延楨在《合众国说》中就盛赞美国政治:“于民主政治,颇致倾慕之意”,这在当时也只是学者的私议。^④制度文化的反思出现了前后两种方式:一是变法,引进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以拯救处于危机中的国家,但保守势力比维新变革势力强大很多,所以维新变法迅速失败;二是革命,也就是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专制政体,建立欧美式的三权分立政体。这种方式只是完成了“破”的任务,却没有真正完成“立”的任务,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失败的,但是革命给中国新的政治力量进行制度再造(制度反思)提供了政治和社会空间。

再次是思想文化上的反思。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历史现象,即以下两种社会状况会促使人们进行思想文化的反思:一是社会处于大动荡的时期;二是经济发展态势比较好的时期。晚清至民国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期,这样的社会状况促使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但当时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力量占据中国社会的主流,因此,复古主义、西方主义等派别之间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论战。后来,西方主义又分裂出自由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它们都试图为中国寻找一条未来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忙于各自的战后恢复,放宽了对中国的限制。同时,中国内部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因此,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经济发展同样也引发了“中国走向何处”的文化思考,于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折中主义等派别之间再次展开唇枪舌剑。中国正是在历时了二十多年、分为前后两阶段的思想文化论战(反思)后,逐渐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所设

①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11页。

② 同上书。

③ 陈廷湘、周鼎:《天下·世界·国家:近代中国对外观念演变史论》,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63页。

④ 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计的现代化方案,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而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反思,使中国更加坚定“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①而是走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路。^②

三 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时代背景

虽然当前世界处于大动荡、大调整的时期,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但中国式现代化得益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当然,中国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认知有一个过程,在革命胜利之初,从国际形势来看,东西方冷战的局势日益紧张。由于中国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之下,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成为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国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所有西方国家关闭了交往的大门,相反,中国依然寻找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通道,以促进国内经济建设。1956年8月29日,毛泽东同志在审阅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时特别指出:“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援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③然而,由于当年爆发了波匈事件,国内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产生了偏差,这一偏差延续了二十年之久。换言之,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会直接对中国的内部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不过,现代化作为国家建设的目标从来没有被放弃,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建设才被置于国家战略发展的重中之重,且在内容上和方法上都进行了创新。在内容上,现代化被赋予了“达到小康水平”的内容;在方法上,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现代化建设强调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引进先进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即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页。

^② 同上。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① 这可以说是从中国革命胜利以来,关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并解决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之间的认知矛盾。

这一矛盾之所以能够解决,是因为邓小平同志已经认识到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变化,尤其是认识到“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② 那么,“制止战争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呢?

其一,国际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或者说,国际权力正在转移。在西方学者看来,“权力转移理论的要素贯穿存在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悠久的历史”中,^③甚至可以上溯至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势力的增长,由此而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了”。^④ 这就是后来被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的依据。^⑤ 然而,权力转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直接表现为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和非西方国家出现群体性崛起的现象,而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仅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更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然而,面对一个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不仅西方国家表示怀疑,既有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成员也表示担忧。鉴于此,西方对中国提出了种种要求,当时最有影响的是“中国责任论”。这个话语的确存在双重意味:“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崛起这个现实,它们试图重构同中国的关系,将中国从它们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拉进体系之内,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害攸关方’,与它们共同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个现实,试图找出一个新的话语来塑造、影响中国,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想‘忽悠’‘捧杀’中国。”^⑥ 不过,更重要的是为西方“对中国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使西方大国试图‘掌控’中国崛起的进程”提供话语依据,^⑦并希望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内做一个负责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133页。

② 同上书,第416页。

③ [美]杰克·利维:《权力转移理论和中国崛起》,载朱锋、[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④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

⑤ [美]格雷尔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当然,这个说法受到颇多质疑,参见杨晨祯:《“修昔底德命题”抑或“修昔底德陷阱”——历史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缘由之不同解读》,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90-100页;胡键:《大国成长的困惑:“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杜牧陷阱”?》,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第3-17页。

⑥ 刘建飞:《“中国责任论”考验和平发展》,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4期,第22页。

⑦ 胡键:《“中国责任”与和平发展道路》,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7期,第44页。

大国。很显然,西方对中国的角色认知一直是刻板的,“中国曾经是殖民主义体系和西方主导的旧秩序的破坏者和挑战者,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这种国际角色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也是不会改变的,中国在当今的崛起使中国更加具备作为挑战者的实力”。^①然而,他们忽略了当今中国崛起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和发展条件与历史上西方大国崛起之时的情况根本不同。^②实际上,中国对自己的角色早就做出了明确的定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③为了回应“中国责任论”等话语,中国于2005年和2011年先后出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的和平发展》两部白皮书,并向世界宣示:中国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在坚持自己和平发展的同时,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积极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繁荣。党的十八大以后,和平发展不仅载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而且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正式写入宪法。这充分彰显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

其二,科学技术是遏制战争的因素。诚然,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技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确成为战争的利器,但就其创造发明者的主观愿望而言,技术发明的目的是服务人类。技术被作为战争的工具,不是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是使用技术的少数人伦理道德的沦丧而导致的技术异化的结果。然而,总体上来看,无论是规模还是质量,技术服务人类的成分要远远大于伤害人类的成分。甚至当技术作为战争利器的时候,也存在另外一面的功效,即相互遏制,使战争的双方慑于技术的伤害而走向妥协。最典型的就是核武器,作为一种超级杀人武器,核武器在二战的尾声第一次被运用于战争。同时,它也第一次以最可怕的事实提醒人们:技术的不当使用将会摧毁人类。这就是技术之下的“恐怖平衡”。战后爆发的核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无论危机的双方美国和苏联最初有多么强硬,但最终都慑于核战争之下没有胜利者的恐惧而走向妥协。技术促使技术使用者追逐以利益为主的动机,使技术回归到遏制冲突与战争,并发挥最大效能为人类服务的功能。在进入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以后,技术的巨大摧毁作用更加使得人们由于对这种结果的畏惧,而避免把技术直接转化为战争利器。事实上,人类历史就演绎了一个战争催生技术、技术遏制战争的国家间关系史。

① 胡键:《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8期,第52页。

② 参见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15页。

其三,尽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①但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的愿望不会改变。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采用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和战略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在大部分领域“脱钩”,甚至双方都担心中美关系陷入“新冷战”。这无疑是“世界之变”的最重要表现。当然,即便如此,中美两国都不希望、不主张两国关系发展至“新冷战”状态,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特别是过去40年中,中美合作已经建立起比较广泛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在合作中产生了比较大的“附加值”,这为双边关系重新走向正和博弈提供了新的可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三年之久,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贸易链、价值链等的断裂和重组,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世界各国对全球化和全球合作产生了新的期待。然而,俄乌冲突及由此引发的俄罗斯与美国、北约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是深度演绎了当今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在俄乌冲突之下,不只是乌克兰人民、俄罗斯人民渴望和平,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意以生命的代价,用武力来解决世界各国的争端。简言之,和平永远是人类不二的选择。这就是四百多年前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第一自然律所说的,“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应当力求和平”,^②以及由它所包含的“寻求和平、信守和平”的法则。^③这样的法则迄今为止,乃至未来,依然是人类对和平需求的反映。

中国式现代化恰恰就是置身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的伟大实践。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使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具有必然性;中国式现代化同时赋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以全新的内涵。

四 中国式现代化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践统一

国际上或许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视为一种政治宣示,并非一种客观实际。因此,在“中国威胁论”等话语不攻自破以后,21世纪初,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出版了一本书,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不能和平崛起的论调,他以进攻现实主义理论为依据,认为“崛起的中国不仅会追求地区霸权,在亚洲之外也会有战略利益……所以中国按进攻现实主义行事,就很有理由干涉美洲政治,好扰乱美国后院,让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0页。

^②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8页。

^③ 同上。

美国在全球运动不那么自由”。^①几年来,由于“全球信任赤字”日益凸显,^②中美之间的“互疑”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因此,西方尤其是美国无法正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实,但中国式现代化却以自己的实践揭示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丰富内涵。

其一,中国的崛起方式是一种制度性崛起。大国成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工具性崛起,即建立在某种或几种国家实力要素提升的基础上,并以此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另一种是制度性崛起,即国家在成长过程中既注重自身实力增长与外部制度的协调性,又注重自身实力的增长与内部制度的协调性。^③当然,关于大国成长方式的研究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资中筠先生采用的是“硬件”“软件”之说,“硬件”指的是物质的和表层的:科技、经济、军力等;而“软件”则包括精神、思想、历史传统、价值观念、信仰习俗等;^④而郭树勇教授则提出了“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之说。^⑤虽然相关研究的表达不同,但其内容是大致相似的,只是本文所说的“工具性崛起”和“制度性崛起”更为具体和更具有针对性。中国的“制度性崛起”尤其表现在自身实力成长与内外制度的协调性上,如果实力成长与内部制度不协调,则会导致内部因发展严重失衡而陷入动荡,但中国没有出现这种情形;如果实力成长与外部制度不协调,则会对外部制度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会导致武力颠覆既有的国际体系,中国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形。中国不仅维护既有国际体系,而且尊重既有国际制度,在此前提下,中国倡导对既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使其更有利于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更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其二,中国以和平方式进入国际体系。与“制度性崛起”相关的是,中国是以和平的方式进入国际体系的,具体的和平手段在于:一是“利益嵌入”,把中国的利益通过经济合作的方式嵌入国际体系和相关国家的利益之中,从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二是“市场对接”,把中国的国内市场通过经济合作,特别是贸易和投资,与其他国家的市场对接在一起;同时也包括把中国的市场机制与其他国家的市场机制在具体的合作中进行相互接纳,从而形成一体化性质的统一市场,最后相关各国则会为维

①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01页。

② 吴志成、李佳轩:《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国视角》,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6期,第24页。

③ 胡键:《角色·责任·成长路径:中国在21世纪的基础性战略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

④ 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卷),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页。

⑤ 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西方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护统一市场的正常运作而形成一种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①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基本上是以“利益嵌入”的方式融入国际体系的。从国际实践来看,中国的融入方式与策略是非常成功的,否则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难以获得必要的初始成本,也很难获得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不过,这两种方式并没有明确的时间先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的开启,“利益嵌入”与“市场对接”其实是同时进行的。但在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之后,其实践在过去的十年中取得了重大成功,而六大经济走廊及其相关项目,正是“市场对接”的重要通道和重要实践。

其三,中国以和平的方式创新国际公共产品。诚然,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之初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消费者”。一方面,因为中国作为初来乍到的新成员,主要还是借助既有的国际公共产品来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和必要的国际尊重,此时中国主要还是对国际公共产品,尤其是国际制度抱着学习的态度。另一方面,虽然中国有能力塑造国际公共产品,但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将国际公共产品内化以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公共产品提供和创新方面仍然“没有很多话语权”。^②但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之后,随着本国实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逐渐获得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当然,中国在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不是要否定既有的国际公共产品,而是在继续维护既有国际公共产品的前提下,进行相关公共产品的创新生产,尤其是在既有国际公共产品尚未覆盖的区域和领域,创新相关公共产品以作为补充。中国在国际公共产品的创新供给方面的特点:“一是指提供的方式不同,完全是在协商的基础上共同创设的;二是机制不同,不是大国主导,而是成员国一律平等的;三是公共产品具有开放性;四是不针对任何第三方。这样的国际公共产品不会被大国‘私有化’,也不会引起第三方的不信任或敌意。”^③中国与有关国家倡导成立的上合组织、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等,事实上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它们都体现了中国对国际公共产品创新的和平方式。

其四,中国以自身的和平方式来“反哺”世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的力

^① 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塑》,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4期,第16页。

^② 裴长洪:《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载《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第10-11页。

^③ 胡键:《“一带一路”的国际公共产品功能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载《国外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第9页。

量与智慧。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是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并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所致。那么，发展起来的中国将以什么姿态对待世界呢？中国的姿态就是“反哺”世界。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践，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以促进世界尤其是相关国家的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既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即2.0版）实践，也是中国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来“反哺”世界的伟大实践。这是中国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面对世界的“反哺”。在新时代，中国将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②这种新的发展格局不仅是中国内部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也是中国高质量“反哺”世界的全新布局。二是“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致力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③西方传统的权力政治学是以实力为杠杆来推动国际体系建设的，其结果不可避免地陷入冲突与战争。有学者提出“合作主义”政治学，并认为这是中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国政治悲剧”的路径。^④这也是中国从安全与稳定的角度对世界的“反哺”。三是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与国际社会共赢发展相统一。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⑤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只是追求狭隘的国家利益；相反，中国不仅反对一切干涉别国内政的强权政治行为，而且强调“对中国负责”，同时“也对全人类负责”。^⑥“一带一路”倡议所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正是直接体现了“对中国负责”和“对全人类负责”的有机统一。

五 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8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8页。

③ 同上文，第60页。

④ 刘建飞：《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第189—202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48页。

⑥ 同上书，第361页。

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提出的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世界目标,然而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以及由此导致的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对世界的危害深重。因此,和平发展已经被严重侵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都非常严重;安全化趋势日益明显,安全赤字也日益突出;全球治理处于历史转折点,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但全球治理赤字也日益严重。这一切都需要人类共同寻找破解的路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使“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② 中国不是仅仅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作为一种美好的理想提出来的,而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中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路径”。

其一,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来推进世界和平。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与和平发展道路有机统一的实践,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绝对不是权宜之计。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更以此作为长期的方针。因此,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来实现振兴的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也成为推进世界和平的伟大实践。由于中国是较晚加入国际体系的,加之中国崛起的速度完全超出了西方国家的预料,因此,西方对中国角色的骤然改变产生了巨大的不适应性,并由此对中国的角色产生曲解和误解。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坚持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和平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将为世界和平提供“中国式路径”,也将开创世界和平的新局面,以中国的和平方式消除世界和平赤字。

其二,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推动世界共同繁荣。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开创的,也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功得益于世界的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进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种看法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新的认识,即“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发展越来越同步化,中国与各国利益越来越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这既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也推进着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③ 也正因为这种同一性,中国特别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2-6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475页。

^③ 黄仁伟:《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超越》,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8期,第7页。

重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性和关联性。2021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全球发展倡议”直面当前全球困境,在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八大重点领域提出合作设想和方案,这实际上是用中国智慧打开世界共赢发展的大门,以中国路径开创世界共赢发展的康庄大道。这样就有可能使世界消除发展赤字。从这一点来看,“全球发展倡议”的确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保障”。^①

其三,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推进包容世界的建设。全球化是世界的客观趋势,但全球化并非同质化,“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多种宗教。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②世界虽然依然是无政府状态,但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包容的世界。包容性并不是否定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相反是在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下——也正因为是有序的无政府状态——才有可能产生包容性的世界价值。当然,包容成为当今世界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是基于世界进入后霸权时代的国际背景。^③“后霸权时代”也意味着国际格局的一种现实,美国在霸权衰落的过程中往往以“绝对安全”为其追逐的目标,从而引发了地区冲突和动荡。鉴于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11月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这就意味着“全球安全倡议”整合了安全战略模式、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④从而使中国能够有机会从制度上确保以中国式现代化、以包容的全新价值取向来推进建设一个普遍安全世界的建设,为消除全球安全赤字做出中国的努力。

① 廖炼忠:《全球发展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载《世界民族》,2023年第1期,第4页。

②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

③ 秦亚青:《世界秩序的变革:从霸权到包容性多边主义》,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1年第2期,第1-15页。

④ 陈须隆:《从三个视角探究全球安全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年第4期,第160-163页。

其四,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全球治理赤字不是一种新现象,冷战时期美苏对抗导致联合国无法应对全球安全的挑战,就是一种典型的全球治理赤字。^①但是,全球治理赤字在21世纪又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②在这种情形下,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尤为必要,也需要寻找新的路径。全球治理无非基于发展与安全两大目标的世界秩序,全球发展不仅要解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贫困和赤贫问题,而且要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贫富鸿沟”问题。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不仅强调发展优先,而且更强调共赢发展。世界共赢发展将为全球治理提供物质保障和全球共识。全球安全既包括各国自身的安全,以国家的安全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也包括国际环境(国际制度环境)的安全。而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不仅强调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而且强调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这也就意味着“全球安全倡议”将国内安全与全球环境安全有机地统一起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③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为消除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一条可靠的路径。

六 结语

在关于用什么样的概念来表述中国发展实践的问题上,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争论,这些争论恰恰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也意味着其理论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概念的争论也就是话语的争论,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迅速发展的当下,概念、理论、话语的创新显然滞后于实践。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恰恰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概念、理论和话语来进行科学阐释。仅此而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任重道远。

^① 庞中英:《全球治理赤字及其解决——中国在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中的作用》,载《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第4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6页。

^③ 同上文,第62页。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肇始于鸦片战争的失败,并在近代中国百年的社会变迁中慢慢酝酿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实践。不过遗憾的是,从林则徐、魏源到洋务派、维新派,乃至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没有真正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问题。只有当现代化、民族复兴与科学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才找到了一条成功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改革开放,尤其是新时代,被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因而,被命名为“中国式现代化”。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实践都发轫于近代中国,历经了西方列强对华的蹂躏,因而对和平发展有特别的情怀,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特别强调要尊重他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是中国对和平发展的认识产生重大转型的结果,没有对和平发展的正确认识和科学判断,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就难以开启。也正因如此,中国式现代化自然地与和平发展道路在实践上形成有机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虽然是基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实践的现代化,是把中国引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条不二路径。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又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将以推进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共同繁荣、建设包容的世界、建设公正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己任。因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努力消除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的重要保证,也将成为中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的路径选择。

(作者简介:胡键,上海政法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院教授;责任编辑:蔡雅洁)